

热历史

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制度是怎样确立的

每年全国两会,都要由政府首脑举行两会记者招待会。那么,两会记者招待会是何时开始常态化、制度化的呢?

首次新闻发布会始于1983年6月

两会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,始于1983年6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。上世纪80年代前后,我国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,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。在这个大背景下,两会召开换届的会议,引起了海内外众多传媒的广泛关注,包括港澳台和外国的不少新闻媒体都希望能够到北京采访两会。

两会秘书处同有关方面经过慎重考虑,决定扩大两会对外开放的程度,在这1983年两会召开之前,分别举行新闻发布会,并邀请和欢迎港澳和外国新闻机构派记者采访。此举受到境外新闻机构的普遍好评,认为这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有力举措。

1983年6月4日上午,两会首任新闻发言人——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副秘书长曾涛、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孙起孟,分别受各自会议秘书处的委托,同时向中外记者发布了关于召开两会的新闻。自那时起,两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就一直延续至今。

记者招待会制度始于1987年

政府首脑举行记者招待会是新中国的一个传统,从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可是从制度上予以规定的是从1987年开始的。

1987年中央宣传部、中央外宣工作领导小组等部门联合发文,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制度作出规范,建议在转折关头举行的一些重要会议和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,可由领导人举行记者招待会,就主要问题做介绍。

1987年两会期间,领导人举行的多次记者招待会,通过电视播放实况,引起了强烈的反响,获得普遍好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是领导同志同广大群众的直接对话。当时美国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的报道说:“中国政府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了数次记者招待会,报道了记者向国家高级官员提问的种种情况,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。”这使人们认识到开放

型报道优于封闭型报道,针对性报道优于回避性报道,推动了新的新闻报道观的建立,使后来的新闻报道不断提高开放程度。

1988年的两会,也就是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,这是一次换届会议,热点多,公众关注度高。中央电视台开始直播两会记者招待会,总理答记者问的场景就进入了寻常百姓家。由于记者提的问题在群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,使政治透明度有了极大的提高。

1991年6月,李鹏同志受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发言人周俊的邀请,第一次以总理的身份参加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,至此,记者招待会的规格与级别均达到了一个高峰。除了1992年的两会总理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外,从1993年开始,两会期间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常态化、制度化了。



1983年6月,全国人大发言人曾涛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

新闻发布会被赋予法律效力

1980年,“四人帮”集团受到法律的审判,全国人大常委会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,由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作为发言人,向中外记者发布关于审判“四人帮”的决定。

1980年,中国政府还召开了另外一次重要的新闻发布会,就是向国内外公众发布关于“渤海二号”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的调查和处理结果。关于“渤海二号”事故调查和处理结果的新闻发布会,是中国政府首次对突发事件进行新闻发布,它与审判“四人帮”的新闻发布一起,成为改革开放后中

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起点。

1987年,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、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期间,中国记协协助大会新闻组,组织了一系列重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和各种会见活动,由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军队、外交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同记者会见,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,受到外国记者和港澳台记者的欢迎和好评。

1987年4月4日,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,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徐信宣布了一个惊动世界的信息:

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!裁减员额100万后,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!”1988年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,此后我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。

1989年4月4日,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事规则》明确规定: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、记者招待会。”至此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新闻发布会被正式赋予法律效力。

(摘自《安徽日报》)

共享单车火了! 凤凰、永久二八车……

那些年满街的自行车您还记得吗?

共享单车火了。一时间,在大城市拥挤的街头,骑着辆亮色单车兜兜风好像成了桩赶时髦的事儿。然而,倒转几十年,自行车是中国人最重要、最青睐的代步工具。作为曾经的“自行车王国”,最生动的名片,就是清晨与黄昏的长安街两侧,自行车洪流绵延无尽、滚滚而来。

1950至70年代:大件儿之首“二八车”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自行车对于普通家庭来说,属于奢侈品和稀罕物。谁家有两辆自行车,可比现在有辆汽车还显得“土豪”。人们生活富足,喜购年货的象征,就是“骑着倍儿新的自行车,带着彩花的暖水瓶”。当时,一辆自行车售价100多元,而一般工人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四十元,买车很不容易。

那会儿,自行车除了用于上下班乘骑,更有个任务是负重运输,一大家子要采买些沉东西、上远地儿接个人,都指望这辆车。所以尽管也有轻便车型,但最受大众欢迎的,还是异常扎

实、能驮一家三口的载重型28英寸男车。十岁上下的孩子偷偷学骑车,也都是用这种大块头的“二八车”。直到今天,许多人还有童年握定车把、稳着车架、斜着身子,把小腿穿过横梁下方空当努力去够脚踏子的练车记忆。

1978年以后,随着生活逐步改善,耐用消费品需求全面增长,“三转一响”(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)成为大家结婚置业的必备物件。作为“大件儿”之首,无论城乡,自行车到处脱销,“凤凰”“永久”“飞鸽”等名牌自行车更是异常紧俏。

1980年代:“一人一车”的自行车王国

1981年5月,国务院召开全国日用机电产品工作会议,决定大力发展自行车等10种日用机电产品的生产,各地争先兴建自行车厂和零配件厂。1983年,全国自行车实际产量达2758万辆。1986年,仅前11个月全国自行车产量就达3229万辆,相当于平均一秒钟,就有一辆新自行车出厂。

随着人们收入不断提高,很快,许多人结束了骑破车旧车、骑大号男车的历史,街头也不再

是“黑骑军”的天下,开始多了各种型号、色彩、样式的自行车。到了1980年代末,千万人口的北京,已拥有800万辆自行车,除去老人孩子,能骑车的几乎已是“一人一车”的饱和状态。

随着城市日益现代化,必然要求城市交通管理越来越严细,越来越要求人们有秩序、有准则地来行车走路。那种想怎么骑就怎么骑的日子,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1990年代:汽车时代挤压骑车空间

以北京为例,新中国成立初期时北京的机动车只有2300辆,1978年发展到7.7万辆,又过了差不多20年,1997年2月,北京的机动车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,而仅仅6年半后,2003年8月,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200万辆——无人怀疑,北京已完全进入汽车时代。

普通人拥有私家车的梦想逐渐照进现实,但随之而来的是自行车骑行环境的改变,不少骑车人感觉路越来越难走了。行人和自行车违章严重,想减少违章行为,需要规则上的保证和设施上的完善。

就市区混合交通信号灯的配置来说,全是针对机动车的,



1983年12月1日,西单路口的自行车流

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通行权从属于机动车。绿灯一亮,机动车、自行车一拥而行。一些公交车站多的路段,骑车人骑一百

多米就被挤上快车道。此外,机动车乱停乱放,长期占用慢行道和隔离带,众多骑车人只好在汽车长龙中求缝钻行。

新世纪:骑车就是选择了环保

虽然随着驾车出行急剧上升,骑车出行比例逐年下降,但与此同时,自行车也不再是单纯的实用型代步工具,而渐渐有了时尚、运动、休闲等新定位。

款式新颖、骑行便捷的山地车、变速车,已是消费主流。在售出的自行车中,600元以上的高档车约占70%。

到了1990年代末,大多数店里都摆满了山地车、赛车、特技车等流行款式,普通大众车则被挤到了角落里。一批自行车发烧友不惜花重金装备自己,一辆车再配上头盔、眼镜等保护装备,重新成为家里的大件儿。

2000年后,随着全社会环保观念与日俱增,选择自行车

代替私家车成为绿色出行的标志,越来越多人意识到,自行车是解决城市交通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的好法子,公共自行车系统在各个城市出现。“设置专用道,还路自行车”,保障自行车路权 and 安全的呼声高涨。有调查显示71%的网友表示支持“骑自行车该给补贴”。

(摘自《北京日报》)

一本小说改变美国食品安全史

《屠场》催生了美国FDA

“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;工人们在肉脰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;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;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。”这样令人作呕的场景,是美国作家厄普顿·辛克莱100年前的小说《屠场》的片段,描绘的是芝加哥肉类食品加工厂。

此书的作者通过自己在芝加哥肉联厂里的亲身经历,揭露了当时美国的食品安全现状。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在白官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。读到这里时,罗斯福大叫一声,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,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

肠用力抛出窗外。

罗斯福看过此书后,专门约见了作者辛克莱,并责令美国农业部调查肉联厂的情况。调查的结论是“食品加工的状况令人作呕”。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,当年6月美国国会即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: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,并建立了以化学家威利博士为首的,共11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班子,形成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的雏形。

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整治,《屠场》一书中描述的场景从此在美国销声匿迹。

(摘自《南方周末》)

陆游也是“老药工”

从小喜读医书,在中药鉴别和炮制方面经验多

南宋爱国诗人陆游,以高产作品著称,自言“六十年间万首诗”,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,是我国现存诗作最多的诗人。陆游留给人们所熟悉的还有他和表妹唐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。不过,陆游也是个“老药工”,却鲜为人知。

或许是古代文人兼习医理的缘故,作为高产诗人的陆游在云游名山写诗作词的同时,也喜欢采集草药。在他留下的9300多首诗中,有许多记载他的医药学活动。陆游在《五律·自讼》云:“采药思长往;传书却小留。”在《急雨》中谓:“疾雷载雨输膏泽,茂树生风洗郁蒸。采药喜逢岷下客,说诗曾对剡中僧。”这些诗充分记载了陆游采药的实践活动。

其实,在成为大诗人之前,陆游从小就喜读医书,在家乡绍兴时,还亲自执锄,治地开药圃,种植药草,配制丸丹,他家常有“杵声起”,不时飘出“药尘香”。这可在陆游的《药圃》诗中得到印证:“少年读尔雅,亦喜骚人语。幸兹身少闲,治地开药圃。……老夫病若失,稚子喜欲舞。”

由于喜爱医药,陆游在中药鉴别和炮制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。如《山村径行因施药》写道:“村翁不解读《草本》,争就先生辨药苗。”充分显示了陆游虚心好学,刻苦学习中药鉴别知识。而且,为了掌握中药鉴别知识,陆游还不辞艰辛,在严冬或者疾病缠身之时仍然孜孜不倦钻研中药知识,进行炮制活动。在他的诗中记载:“寒气薄膜理,沉痾结心膈。造奴买药物,日夜事炮煮。”在56岁时,陆游还将他平生收集验证的100多个药方编辑成了《陆氏续集验方》2卷,可惜已佚。

陆游成为“老药工”很重要的原因,在于他身在朝中不忘百姓疾苦。



陆游

1175年,范成大镇蜀,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。他目睹成都百姓染病待毙的惨状,慷慨解囊,广置药缸于街头,亲自配制汤药,请患者饮药,治愈许多人。他曾作诗曰:“我游四方不得意,阳狂施药成都市,大瓢满贮随所求,聊为饥民起憔悴。”有关他的治病施药诗句有:“藿藿药发每随身,问病求占日日新,问道不能渠岂信,随宜酬答免违人”;“药粗野志偏生效,诗浅山僧妄谓工”;“几扶一老候溪边,来告头风久未痊,不用更求芩芷辈,吾诗读罢自醒然”;“驴肩每带药囊行,村巷欢欣夹道迎,共说向来曾活我,生儿多以陆为名”;“举手扣柴扉,病衰喜出迎,以我语蝉联,未寒畴昔盟,解囊付之药,与尔共长生”。

晚年的陆游,更是为百姓着想,“村西行医到村东,沙路溪流曲折通。莫为梅花开早晚,杖藜到处即春风。”陆游到处为百姓行医施药,赢得了众人对他的爱戴。

(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)

掌故 |

天花乱坠原指吉祥

天花乱坠一般用来指说的话夸张而不着边际。

实际上,天花乱坠原本出自佛教,本意是指讲经讲到妙处时感动了上天而出现的一种吉祥景象。《妙法莲华经》中描述:释迦牟尼

尼为众菩萨讲经时,“天雨曼陀罗花,摩诃曼陀罗花,曼殊沙花,摩诃曼殊沙花,而散佛上、及诸大众。普佛世界,六种震动”,人人身心欢喜。

(摘自《新说文解词》)

“斧正”真是用斧劈

文人请他人给自己的文章提意见,总会说“请您斧正”。修改文章为什么要用斧子呢?

“斧正”一词源于《庄子》:楚国有位叫做郢(音颖)的人,在鼻子上刷一层薄薄的石灰,然后让一位叫匠石的朋友拿着斧子照着鼻子抡下去,斧子把郢人鼻子

上的石灰削掉了,但鼻子毫发无伤。旁观者都惊慌失色,这两人却神色自若。

这个“绝活儿”需要双方配合,“斧正”者和被“斧正”者都要有高水平。后人就以此将“斧正”引申为修改文章。

(摘自《新说文解词》)

“文学”原为官职名

西汉时期,学校的负责人不是叫校长或教官,而是称“文学”,即负责人称为张文学、李文学等。汉武帝为选拔人才,特设“贤良文学”科目,由各郡国每年举荐人才上京考试,被举考者便叫“贤良文学”。“贤良”是指品德端正、道德

高尚之人;“文学”则指精通儒家经典的人。

魏晋后期,“文学”一词成为语言艺术的专用名词。史书记载的曹丕“好文学,以著述为务”,即是现今所指的文学含义。

(摘自《文史博览》)

欢迎广大读者朋友扫码关注鹤壁日报文史博览微信公众号,看更多精彩内容!

欢迎读者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中留言,向我们推荐您觉得有意思的文章。